本版编辑：曹颖新
E-mail：m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236

文化新论

从传统文化中学什么

□ 赵迎辉

在实践当中，受功利性读书观影响，个别领导干部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有失偏颇，存在着“肤浅化”“庸俗化”“教条化”的倾向：或为了解官场文化，或为洞察厚黑之学，或为学习处世之道，或为熟谙潜性规则……凡此种种，都是将学习作为实现既定目标的手段，背离了学习的本旨。至于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只是拿传统文化来装点门面、自我标榜的，也是有的。培根曾经说过：“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也不是为了轻信和盲从，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领导干部学习传统文化，应当树立正确的目标取向，选择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防止误入歧途和陷入盲目。

修身之德

古人非常注重道德品质的培养，传统文化当中的修身克己思想随处可见、俯拾皆是。《大学》一开始就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强调“一切皆以修身为本”。《左传》提出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并将立德奉为“大上”即最高层次。孔子要求杀身成仁，孟子提倡舍身取义，曾子则曰“一日三省吾身”，林则徐更是指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至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更是许多士大夫一贯秉承的价值追求和道德准则。当今领导干部承担着执政兴国、执政为民的重要职责，认真学习传统文化，努力加强自身修养，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可以说是为政的基本条件。这就需要广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传统文化当中的修身克己思想和自我反省精神，不断提升道德境界，学会知足、知止、知畏、知耻；勇于进行自我剖析，做到慎独、慎微、慎初、慎终。并通过长期的砥砺坚持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生活上的日常规范和工作中的行为准则。

为政之道

传统文化当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治国理政方面的探索和智慧，比如：“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宇宙观和世界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以及“治大国若烹小鲜”“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治理经验，等等。实践证明，有些探索和智慧直到今天对于中国乃至世界仍然具有历久弥新的时代意义和借鉴价值。上世纪末，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瑞典人汉内斯·阿尔文教授曾经指出：“人类要想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两千年前，从孔子那里寻找智慧。”作为领导干部，应当认真总结历史上的治国理政思想和方略，从中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并结合当今的国际国内实践进行创造性地转换重塑和批判性地继承发扬，不断提高治国理政的本领。

兴替之律

历史记载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古往今来的兴衰治乱、各种人物以及制度沿革等，是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古人云：“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恩格斯指出：“我们根本没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多学习一些历史知识，有助于开阔我们的眼界和胸襟，在认识问题时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以历史眼光来想问题、作决策；有助于我们从中总结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找到前进的正确方向，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有助于我们获得经验和启示，并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来很好地指导我们今后的实践。能看得见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得见多远的未来。领导干部只有认真学习历史、深刻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现在、面向未来。

审美情趣

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不是为读书而读书，而是为修炼心性、完善人格，为培养高雅的审美情趣。黄宗羲曾经说过，“人不读书便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林语堂认为，“读书的主旨在于排脱俗气”，强调的都是读书对于精神气质的培养和熏陶。曾国藩则曰，“刚日读经，理气养生也；柔日读史，生情造意也”，俨然是把读书学习作为一种生活情趣、一种休闲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心灵体验，尤其是文学艺术作品，更是以其深邃的思想境界和极高的文学造诣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国人的精神世界。品读这些文学艺术作品，无论是唐诗的慷慨激昂，宋词的浅吟低唱，还是明清小说刻画的世态炎凉、人物群像，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的陶冶、心灵的洗礼。

总之，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需要秉承科学客观的态度，既不能照单全收，更不能全盘否定。对其糟粕，比如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官本位意识等，要深挖其历史根源，以达到批判当下时弊的目的。对其精髓，则要本着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原则继承发扬，进而养成“良好的行为规范、深邃的哲学思想、质朴的道德操守和高雅的审美情趣”，这既是国学复兴的题中义，也是领导干部的必修课。

领导干部应该补上国学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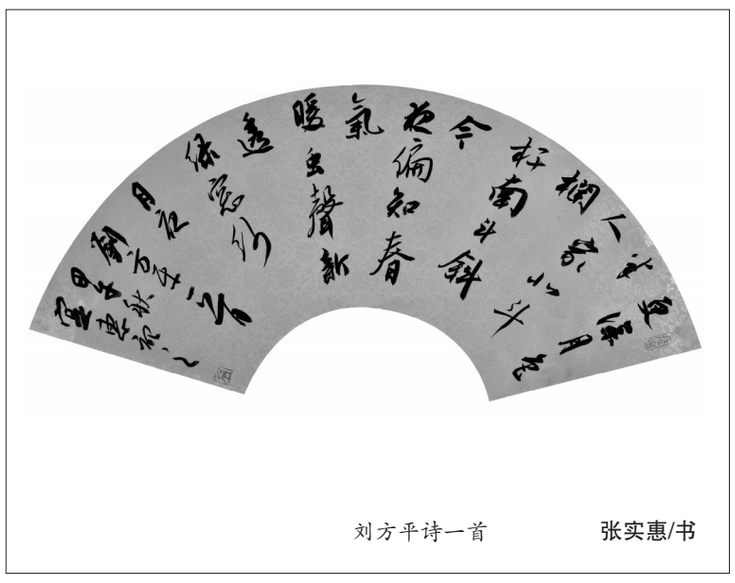
本报讯（记者 曹颖新）7月12日上午，“首届领导干部国学论坛暨国内首家国学移动社交平台启动仪式”在中共中央党校召开。论坛围绕“领导干部学国学学什么”，“学国学对提高党性修养、官德修养、人文素养有什么好处”，“当下应该如何推动领导干部学国学”三大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领导干部学国学要学什么？很多专家学者都说到，首先要学修身做人。清华大学教授钱逊说：“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文化最核心的精神就在于人们的修养问题，做人的问题，用一句话来说，大学里面讲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遇事皆以修身为本。修身问题是根本，是儒学根本精神，也是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小文说：“做官先要做人，做人就要修身，修身必学国学；修齐治平君子之德是领导干部特有的精神滋养和文化标识。”中央党校教授王杰说：“‘三严三实’第一严就是修身，所以把修身做好，其他一切就有根基。”

领导干部学国学应该怎样学？北京大学教授张希清联系到了“三严三实”的要求：“当官执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廉政、清正，也就是‘三严三实’里的严以律己，谋事要实；慎政，就是为官谨慎、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不能心血来潮、独断专行、盲目决策，也就是‘三严三实’里所说的严以用权。”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桂钿说到了国学的主要载体经史子集：“国学博大精深，内容广泛，文献资料主要是经史子集。哲学家提出方案，政治家实践，历史学家总结，总结出来的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教训和经验。这些政治智慧非常值得领导干部学习。”

专家们还谈到，领导干部学国学用国学，应对自身有更高要求。中央党校教授宋惠昌说：“孔子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聪明人都不好学，在上位置的都耻于下问。这对领导干部来说值得警醒。孔子还有一句话，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个精神值得我们玩味，还有孟子一句话，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退休以后回忆，我做行政领导工作，养成了坏习惯，就是说话或者写文章指令性语言特别多，‘你们必须’‘你们一定要’，这一类话明显是好为人师，自居高位。这种话还是去掉为好，用商量、讨论的语气更好。”

谈到如何推广这个事业，专家学者们认为应该把这个事业做大做深入，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说：“要把领导干部学国学这个口号推广开来。推动还需要引导，引导就是要告诉领导干部读哪些书，学哪些知识。也要注重手段的现代化，时代变化很快，把互联网、APP这类新技术手段跟古代传统方法结合起来，是有重要意义的。”



刘方平诗一首　　张实惠/书

应驮白练到安西

□ 高建新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与文化通道，经历了汉朝的繁盛之后，到了唐朝再次被完全贯通，而且更加宽阔，繁盛程度也达到了顶峰。唐玄宗继承了唐太宗开放的文化政策，提出“开怀纳戎，张袖延狄”的主张，继续开拓“丝绸之路”，使其连通了当时的大半个世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通道。

唐代“丝绸之路”经过今天新疆境内的也有三条：南路出阳关，经且末（今新疆且末）、于阗（今新疆和田），至天竺（印度）等国，玄奘归国时走的就是南路；中路由龟兹（今新疆库车）抵疏勒（今新疆喀什），经葱岭（今帕米尔高原），至波斯（伊朗）、地中海沿岸；北路“自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西延城西”，“又西行千里至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巴尔喀什湖附近）”，至里海沿岸，岑参诗中多有描述，如“大荒无鸟飞，但见白龙堆”，“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仍下，朝风夜不休”，岑参诗突出了“丝绸之路”北路的荒寒遥远。另外，“交通的日益发达使得商人们能够通过草原、戈壁、沙漠、雪山、丛林、大海等任何一种自然环境而开辟途径，而且在它们之间还开辟蹊径。这样，使得唐代丝绸贸易成为一种网络式流通”。

漫长的“丝绸之路”上，驼队络绎不绝，热闹非凡。中唐诗人张籍《凉州词三首》（其一）描绘了当时运输丝绸的动人景象：

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
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

安西，唐藩镇名，初以安西都护兼四镇经略大使，开元六年（718年）始称四镇节度使。其后治安西都护府（治今新疆库车），所统辖的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四镇，即安西四镇，皆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太平寰宇记·陇右道·安西大都护府》记载：安西“本龟兹国也。唐贞观十四年（640年），侯君集平高昌，置安西都护府，治在西州”，“东至焉耆镇守八百里，西至疏勒镇守二千里，南至于阗二千里，东北至北庭府二千里，南至吐蕃界八百里，北至突骑施界雁沙川一千里”。安西四镇，从贞观十四年设立，到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年）终止，共存在了150年。这片天山南麓神奇广大的区域，既是多民族的聚居地，又是多文化的汇集地。张籍诗说，春日傍晚、雨丝飘洒，遥远的边城上空雁群盘旋低回，湖中水边青葱的芦笋正在旺盛生长；满载着中原丝绸的一支支驼队，脚步坚实，伴着叮咚的驼铃声，正缓缓行进在浩瀚的沙漠戈壁上，要抵达大唐的西部边陲——安西。

1927年5月，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领着由中外学者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从内蒙古包头出发，经由百灵庙、五原，沿着古代草原“丝绸之路”向西北进发。考察团抵达内蒙古额济纳旗后，在前往新疆哈密的途中，“12月5日，赫定一行遇见了一支庞大的驼队，这支从归化（今呼和浩特）前往巴里坤、奇台（二县均在今新疆境内）的驼队共有1200峰骆驼和90多个人，是几家商号联合起来贩运布匹、茶叶、香烟和日杂用品的”。这个长途跋涉的驼队绵延数公里，蔚为壮观，由此可推想唐代“丝绸之路”的繁盛。

唐代的丝绸品种繁多，织工精美。《资治通鉴》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记载：安乐公主“有织成裙，直钱一亿，花卉鸟兽，皆如粟粒，正视旁视，日中影中，各为一色”。因价值不菲，丝绸曾在一个时期兼有货币的功能，唐代还有所谓的“庸调绢”：“织绢未成匹，缲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丝绸不仅是中国古代先进技术的代表，也是古代优秀艺术的化身，因而深受西方各民族的喜欢。

张籍诗中所说的白练，即白色熟绢。绢分生、熟两种，未经漂煮的绢为生绢，反之为熟绢，漂煮的目的是脱胶、使绢变得柔软洁白。“从敦煌吐鲁番文书来看，在平时的称呼中，绢分生、熟两种，生绢是指未经精练脱胶的平纹织物，其中又有大生绢、白丝生绢、白生绢、黄丝生绢之分；熟绢，是生绢脱胶之后的称呼，又可称为练，练根据尺寸有大练、小练之分”。白练是“丝绸之路”上运送的主要物质之一，被西域诸国奉为至宝。但在唐人生活中却是常见之物：“白练束腰袖半卷，不插玉钗妆梳浅”，“重思醉墨纵横甚，书破羊欣白练裙”。不仅如此，唐人喜欢以白练形容美好的景致：“秦山数点似青黛，渭上一条如白练”，“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张籍诗中的“白练”，也可以理解为唐代色彩绚丽、图案新颖、做工精美的丝绸的代称。

有论者认为，张籍的这首诗“记叙的正是当年中国丝绸经过河西、新疆运往印度、波斯，乃至希腊、罗马的盛况。它告诉人们，现在被淡忘的古丝绸之路，当年是俊马奔驰，明驼驰足的国际贸易大道”。斯文·赫定说，“丝绸成了连接不同民族的纽带，并出现了一条条无穷无尽的商路”，中华文明获得了更加广泛的传播，古代中国尤其是汉唐两大王朝因此更加强大。

中华春秋

史 镜

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异样篇章

□ 任九光

著名小说《官场现形记》中的“制台见洋人”一段，生动描述了晚清官员对洋人的畏惧场景。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晚清官员多数既不敢拒绝，又应对无策，从而惧怕不已。例外的是，张之洞担任晚清总督23年，极力维护国家民族主权、利益，演绎出了与《官场现形记》中截然相反的情景，今日回首仍令人感慨万千。

严辞拒绝法国领事无理要求

张之洞于1884年中法战争失利的背景下，走马上任两广总督。上任后，张之洞多方筹措，在镇南关—谅山大捷中居功至伟。战后法国传教士、领事返华，要求赔偿战争期间被毁坏的教堂财产。张之洞此时痛斥法国无理、法军残暴，指出法军已激起众怒，但在此情况下，中国并未伤害法国商人教士，反而加以保护，“试思去岁贵领事官，如不挈商民等离粤，所有教堂房产，如不由官封守，万一变生不测，何从保卫？何今日不以为德，反以为怨乎？”对于领事师克勤多次提出会见的请求，张之洞始终拒绝。

不得已之下，法国更换领事。新任领事法兰亭发起外交照会，要求中国赔偿损失38万。张之洞书面答复“无可议办”，“以众怒所萃之物业，而居然幸获瓦全，即小有遗落，仅如纤芥，所全于法国者实大且多”。如果法国一味索赔，张之洞则先请法国赔偿中国损失，“查中国自光绪九年办理海防以来，以至十年六月基隆开战以后……损耗银数，约计三百八十余万两。按照万国公法，自应以举兵至人之国生衅者认其咎，贵领事官须先言明，将此项银三百八十万两若何查办？若何归结？筹有妥善切实办法，与本部堂议明办妥，再为查办教堂损失零星物件可也”。张之洞拒绝接见法兰亭，仅以上述书面答复据理反驳。上述内容被记者获悉，刊载见报。登时民心振奋，一纸风传。

在张之洞的强硬之下，法国外交部陷入窘境，不得不再次更换人员，任命白藻泰担任广州领事。白藻泰曾任天津领事，与李鸿章颇有交往。到任之前，李鸿章致电张之洞，请张之洞接见白藻泰，强调法国“系修好之意。白谨慎，必无此等恶习，嘱北洋一语为介”，也想通过缓和局面为北洋外交争得空间。然张之洞外交主张与李鸿章不同，回电陈明，“美素睦，英渐谦，德无嫌谊，当款接。法无礼，故不能不以此折之，非得已也”，指明要刻意整治法国领事的骄横无理，并请李鸿章转告法国公使，“言定以后永不再提此等索偿之谬论，即当见之”。李鸿章和总理衙门都不认可张之洞的举措，“若必先与说定不提此事方可接见，转若示之以怯，恐彼更多借口，不如坦然相见，最为得体，倘彼再申前语，仍可严驳”。张之洞并未照总理衙门指示，仍拒见白藻泰。总理衙门为此专上《请饬粤督照章接见法领事》折，后上谕斥责张之洞，上谕如此，张之洞不得不表示“自当钦遵”。但此后白藻泰未再请见，张之洞亦未主动约见白藻泰，索赔问题也再无交涉。经一年三个月，连续三任法国驻广州领事都没得到两广总督接见，张之洞成为令洋人头疼的制台，也成为总理衙门眼中最不会与洋人打交道的总督。

奏折陈明利害减少损失

随后广州再次发生各国领事要求开通“沙路”而引发的外交纠纷，此事处理中鲜明体现了张之洞的外交立场。当时海路进入广州分南支“沙路”和北支“渔珠”。中法战争期间“沙路”封锁，只留“渔珠”行船。如不开沙路，则外国船只欲进入广州，必须先后通过牛山、长洲、渔珠各炮台；“沙路”封闭超过三年，则流沙淤积使军舰不能进入。各国领事以战事结束，提出开通“沙路”。张之洞出于广州海防角度一一拒绝各国领事。诸领事遂通过驻京公使向总理衙门照会，转而向张之洞施压。在此情形下，张之洞上奏折陈明，领事提出的方便通商、通航等理由，已经在“渔珠”解决，“沙路”封闭实际上并不影响通商、通航，反而方便海关管理，而且从广州长远海防角度看，“此事所关甚巨，不得不再行详切沥陈，仰恳敕下总理衙门立案，永远不予曲从，粤防天下大局幸甚”。除直接上奏折，此时张之洞还私下致函军机大臣阎敬铭，请求支持，“彼（洋人）之惯技，凡无理之事不能得之于粤者，则捏词耸听，嗾其公使向总署渎扰。总署不悉其情，以为彼直我曲，祇疑其势已汹汹，断不能解，恐生枝节，遂已俯允所请，责令外间照办。不知其事在外间甚属寻常，彼已辞穷势绌，（沙河一支河道，不能允其开通。）若总署稍一坚持峻拒，推之外省，不难硬驳善了。以后凡遇洋使搅扰事体，务望总署电询粤省，考其实在情形有无办法，再与定议，必可挽回不少”。由此可见，晚清地方官员得不到中央的支持，是造成制台惧见洋人的重要原因。

内强其国外御其辱的外交原则

随后，因诸多事情得不到总理衙门支持，张之洞直接上奏广东洋务状况，指出来华洋人多有贪利小人，给以小利则可以为我所用，“年来有英人谢耳仕，美人士边臣，皆为厘局作线引拿私货私土”。本来可以占据的主动局面，只因历任官员怕生事端，对洋人无理要求也一概迁就，而形成被动局面，“向来于交涉之件过形迁就，是以愈久愈肆，渎扰不休，每隔数日，必来一见，骄蹇不逊，要求无厌”。张之洞对此陈明自己的原则，“所求事件有理者力任办妥，不必推诿，不待催促。无理者直言拒驳，亦不周旋，若再渎扰，则竟置之不理，百折不回”。为打消慈禧恐拒绝洋人而导致“别生枝节”的担心，张之洞特意指出“彼虽岛夷，亦有政体公论，彼虽强悍，亦有形势牵掣，兵饷不便之处，断不能因无理细故辄启衅端。领事无理生事亦断非其国外部之意，彼看无可如何，自然消沮歇手”。更为重要的是，张之洞认识到外交根本在于国力：“日夜孜孜经营战守，讲求船炮，使彼知我时时有不忘战事、不甘隐忍之志，则可省无数口舌波澜。此尤无形之折冲，探源之因应”。随即张之洞在广东即投入洋务自强实践，经后来一生之努力，成为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最为系统的洋务实践。

两广总督之后，张之洞历任湖广、两江总督和军机大臣。连战连败，国势衰落之下，外交更不堪言。然张之洞在殚精竭虑之中，仍坚持“有理者力任办妥，无理者直言拒驳”的原则，在外交压力下推动清廷完善中国财政、货币、税收、法制等方面建设，又极力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并成为令洋人又敬又怕的清朝高官。1909年，张之洞逝世，“各国驻京公使皆奉其国命致哀悼之意。受吊之日，各使均于几筵致敬”。被称为“最后一个儒臣”的张之洞，在晚清衰落的局势下书写了中国近代外交上的异样篇章。